

数字反哺：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研究

——基于中部地区B村的学术考察

赵红勋 史可凡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的普泛化渗透，农村老年群体的日常实践逐渐被短视频所裹挟。然而，农村老年群体仍属于数字技术实践的弱势群体，需借助数字反哺的话语逻辑来接洽其短视频的实践意义。在数字反哺理论的观照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叙事分析等研究方法，考察中部地区B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问题。研究发现：接入、技术和文化是农村老年人短视频实践的三重反哺类型；反哺场域以家庭代际为核心主体，辅以趣缘社群的关系接连；娱乐、实用和社交构成了老年人短视频反哺的重要内容；反哺层次主要表现为浅层次参与；虽然老年人短视频实践的数字反哺存在浅层次、机械化、模式化等问题，但短视频实践作为反哺的初步成果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甚至是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为平衡当代社会的数字化与老龄化之间的内在冲突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数字反哺；老年群体；媒介实践；短视频；乡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1-0093-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XW092)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短视频不断下沉至农村地区，并日渐成为农村社会日常实践的重要表征。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短视频的娱乐化以及便捷性为其提供了融入数字化社会的有利契机。短视频不仅承担了获取信息过程中的信源角色，而且为老人们提供了可视化传播的展演空间，重构了农村社会实践的既有方式。

尽管短视频向农村的下沉加剧了一大批老年用户的入驻，但他们的短视频实践仍然面临诸多困境：一是资源困境，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收入、文化水平、设备接入、基础设施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新媒体的覆盖面积较小、接触机会较少且使用成本较高；二是年龄困境，老年人的记忆结构、心理感知以及学习能力正在逐步退化，对于新事物、新技术、新观念的认知心理也与时代发生脱节，存在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障碍；三是话语困境，已被资本逻辑深深裹挟的短视频媒介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具有消费潜力的年轻人和城市人，加剧了潜力群体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实践区隔。因此，需要在农村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化之间的重重困境中重新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问题。

在此情况下，“数字反哺”实践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首要途径。年轻子女、新乡贤、返乡青年、年轻村干部、先锋老年群体等都是反哺行为的主体，他们通过对新媒体技术以及文化的知识传授来引导农村老年人尽快适应数字化环境，并帮助他们进行短视频实践。那么，数字反哺行为究竟以何种方式进行？又给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带来了哪些改变？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在数字反哺的理论支持下，以农村老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叙事分析的研究

方法阐释其短视频实践问题,以此勾勒老年人的数字媒介实践图谱。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反哺研究

“反哺”研究的源头是探讨工业革命社会转型背景下文化传承方向的相关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受教育者(晚辈)反过来对施教者(长辈)施加影响的“反向社会化”现象出现。^[1]1987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提出“前喻”“并喻”和“后喻”概念,其中“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向子辈学习的现象。^[2]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洪流中迎来了新技术、新思潮,年轻一代以超强学习能力占据时代前锋,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反向社会化”浪潮。基于此,周晓虹提出“文化反哺”概念,认为“它是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3]。“反哺”一词极具中国文化意味,该名词的提出也预示着“反哺研究”的开端。

随着数字媒介的不断浸入,“文化反哺”日渐生成了新的话语结构——“数字反哺”,即子代对亲代在技术采纳、媒介使用、知识传授以及新文化语境等诸多方面进行传授。^[4]在国外,学界关注到了“数字鸿沟”问题,即“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使用方面的差距”。^[5]也有研究微观层面的产生于代与代之间的数字鸿沟/代沟,主要是在家庭这一社会单位中两代人的媒介使用差异,尤其是新媒介。^[6]“数字反哺”便是作为“数字鸿沟”的一种制约关系而存在。同时,关于“数字反哺”的研究在跨国范围内也广泛存在,并将“数字反哺”视作“自下而上的技术传递”,侧重年轻世代所发挥的作用。^[7]

当前,学界关于“数字反哺”的研究热度依旧不减。它被认为是与数字鸿沟相互制衡的一个概念,存在三个维度,即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7]在中国网民数量不断攀升的今天,数字接入反哺已不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依旧是弥合数字鸿沟的关键所在,尤其是以“文化”为核心的素养反哺成为摆在老年群体面前的障碍。而“家庭代际关系”和“新媒介使用”是当前该领域研究的两个重点方向。

一方面,家庭场域对开展数字反哺具有天然的强落实性和持续性,因而以家庭代际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占据半壁江山,主要涉及代际反哺实践中的家庭关系/互动^[4,8]、伦理建构^[9]、社会老龄化^[10]等问题。数字反哺作为抗衡数字鸿沟的救济措施不仅对亲代主体的数字实践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对以家庭为纽带的亲密关系模式、互动模式有所影响。^[11]

另一方面,通过切入新媒介使用行为来解读数字反哺也是重点,例如针对老年人使用微信、短视频、B站等新媒体而实施的数字反哺,主要围绕新媒介反哺情况、反哺特点、反哺动因、反哺作用、困境等铺展。^[12-14]在数字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关注老年群体新媒介使用行为和新媒介反哺实践,对缓解老年“数字难民”生活困境和话语困境的意义日益突显。

(二)乡村媒介实践研究

Nick Couldry 于2004年发表《媒介的实践化理论》一文,将媒介研究范式从媒介文本或生产结构转向媒介“实践”,^[15]在该理论视域下,“媒介”成为进入并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关键要素之一,更多地突破了其工具性意义而具备了浓厚的社会性意涵。进而,“媒介实践”也被容纳进社会结构,成为同众多生产实践一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媒介日渐下沉并嵌入乡村日常生活的情境下,短视频媒介实践成了热点话题,乡村实践主体也因自身特殊性相应地进入研究视野。媒介实践转向的行动主体是媒介研究实践范式的关注点之一。目前,关涉乡村短视频媒介实践的研究多以青年行动者为主体。乡村青年的日常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能力和家庭婚姻生活都与网络技术的影响息息相关,他们是乡村媒介实践浪潮的积

极先行者,也是乡村地区“后喻文化”的重要输出者和践行者。^[16]自然成为学界的关注重点。相比之下,有关老年行动者的研究数量较少,且主要聚焦于“银发网红”这一先锋群体,而对乡村的普通老年人群缺乏针对性探观。尽管也有学者对边缘化乡村老年人进行了深入阐释,例如何志武等人对华北东村进行田野考察,发现老年的短视频实践是一种能动的、嵌套于日常生活的新型方式,映射出老年对数字生活的再嵌入。^[17]该研究颇具代表性和启发性。但对这一话题的研究数量和研究深度仍有不断拓展的空间。

综上所述,第一,关于“数字反哺”命题的研究数量不多且内容较为分散,研究内容主要侧重家庭代际的微观关系场域;此外,虽然当下“接入反哺”研究的学术考察有所下降,但对于农村老年群体来说仍存在巨大鸿沟,有进一步挖掘空间。第二,从“媒介实践”视角来看,虽有涉及农村行动主体的研究,但多聚焦于青年群体和“老年网红”,鲜有关注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且数量庞大的一般性老年群体。第三,在“数字反哺”与“媒介实践”理论关照下,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深层话语实践困境尚未完全被纳入研究体系,有待进一步考察补充。基于此,本文从“数字反哺”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主要聚焦农村年轻群体对老年群体展开的关于媒介接入、媒介技术与媒介文化的教授行为,为深入理解老年人的媒介使用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选择在中部地区的B村,截至2022年7月,该村有889户,总人口3055人,其中包含60岁及以上的老人500名,占村总人口的16.4%。村中有两家大型钢铁厂,占用了大量耕地,也为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村中单纯依靠种地为生的家庭相对较少,钢铁厂打工与外出务工是村民收入的主要获得途径。因此,B村虽人口众多,但常住人口多为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村落“空心化”问题突出。随着经济发展,B村在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生活环境上有了较大改善,却依旧保留了最初农家院落的住房环境;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提升,家电、无线网络、智能设备也较为齐全。

之所以选择B村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地点,一方面,本文第二作者是B村的人,对该村庄的情况较为熟悉,能够以“在场”的身份进入田野,并方便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另一方面,B村的互联网覆盖率较高,且老年人使用短视频人数较多。村中的老年人都是土生土长,并且绝大多数属于农民出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收入水平一般,智能设备普及率尚可,满足开展媒介实践的基本条件。

本次调研自2022年4月初开始,7月底结束。作者进入B村老年人的生活场域,观察其短视频使用情况,并在半结构化的访谈中形成访谈记录并分析归纳。研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选取样本,最终确定14个研究样本(见表1)。访谈对象的年龄在60岁以上,职业不限,拥有智能设备并安装使用一款及以上的短视频APP或小程序。在访谈前夕,笔者根据初步拟定的问题进行了历时半个月的小范围访谈测试,此后依据前期存在的问题对访谈内容进行小幅度修改,最终确定下来的访谈问题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接受数字反哺的情况;短视频媒介的使用情况;短视频实践的主要障碍。考虑到老年群体的行动、心理以及媒介使用等问题,访谈以实地走访的方式进行,事先征求其同意后进行现场录音,与其进行30—60分钟的面对面交谈。

本研究14位受访对象均来自B村,包含6位男性,8位女性;小学文化程度9人,初中文化程度3人,高中文化程度2人。为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也确保研究内容的客观中立,文章对受访对象进行编号。编号形式采用“性别编号-年龄”的形式,例如“W01-56”表示“女性,01号,56岁”;“M08-77”表示“男性,08号,77岁”。

本研究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访谈内容进行叙事分析。经过对全部访谈内容的整理、分析和归纳,从零散繁杂的叙事中提炼出如下主题。(见表2)

表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短视频使用
01	女	70	农民	小学未毕业	微信小程序“看一看”、抖音
02	女	76	农民	小学	抖音、抖音极速版、快手
03	女	61	临时工人	小学	抖音、快手、西瓜视频
04	女	63	幼儿园保育员	初中	抖音
05	女	68	家庭妇女	高中	抖音
06	女	65	零工	小学	抖音极速版、快手
07	女	60	农民	小学	抖音极速版
08	女	70	原招待所员工	小学	抖音、快手
09	男	63	工厂工人	初中	抖音
10	男	60	建筑工人	小学	抖音、抖音极速版、快手
11	男	66	农民	小学未毕业	抖音极速版
12	男	59	保安	小学	抖音火山版、快手
13	男	72	退休教师	高中	抖音
14	男	78	农民	初中	快手、西瓜视频

表2 农村老年群体短视频媒介实践的叙事主题建构

叙事话语	叙事类型	叙事主题
使用子女淘汰机;没有开通数据流量;家里没装无线网;设备性能较差;态度被动。	接入反哺	反哺类型
下载、安装媒介软件由他人代为完成;接受反哺后能力提升;独立完成简单技术操作;使用媒介解决问题能力差。	技能反哺	
接受文化内容反哺少;态度消极被动;对网络流行文化内容不理解、不关注;有特定审美倾向。	文化反哺	
线上反哺;线下反哺;祖孙代际反哺;家庭关系结构和互动方式变动。	代际关系反哺	反哺场域
同辈人互相教授学习;个体实践与群体实践;拍摄跳舞、唱歌、情景剧视频;反复拍摄同一主题;城乡趣缘反哺差异(地域生活对反哺有影响)。	趣缘关系反哺	
偏爱唱歌、跳舞、搞笑段子视频;内容简单易懂;获得快乐的媒介使用目的;只会拍摄“对口型”视频。	娱乐内容实践	反哺内容
技术性较强,难度大;双方对反哺均表现被动消极;“代理式”反哺;老人心理压力较大。	实用内容实践	
寻求情感慰藉;拓展趣缘社交;巩固同辈社交。	社交内容实践	
老人对于反哺内容的习得情况一般;反哺实践有障碍;媒介实践局限性特征明显。	实践层次	反哺情况和局限
可选择范围变大;活动范围变大;社会关系扩大;社会参与程度提高;促进代际、趣缘关系;自我呈现积极;短视频创收现象出现;助力农村治理和乡民维权。	媒介实践变化	反哺意义

四、研究发现

(一)反哺画像:老年人短视频使用的生动实践

1. 反哺类型:接入、技术与文化的三重实践

过去三十年,与数字媒介有关的文化反哺几乎每隔十年都延伸出一个新维度,从1990年代的“器物反哺”到2000年代的“技能反哺”,再到2010年代的“观念反哺”,层层递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7]而置身于数字化语境,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数字反哺再现了这个过程,依次表现为智能设备的器物“接入反哺”、媒介操作的“技术反哺”和媒介内容的“文化反哺”。

首先,接入反哺的媒介可供能力。美国学者 Paul Attewell 在阐释“数字鸿沟”时提出了“接入沟”概念,即个体在网络或媒介设备的拥有上存在差距。^[18]农村老年人在 ICT 的接入实践中存在明显差距,资源配置、触网机会、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生理机能等都成为他们“接入”短视频媒介实践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作为“数字反哺”顺利展开的第一步,弥合老年群体的“接入鸿沟”尤为关键。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老年人的智能设备接入,多是由于子女来完成,包括子女代为购买手机、使用子女淘汰的设备,行动主体表现出的积极性和完成度均较低。

我是在我儿子高三那一年换的智能手机,他不用了就给我了。(M12-59)

我不会自己下载,都是他们(指子女)给我弄好。(M14-78)

农村老年人所接受的数字反哺尚在接入维度已同其他群体拉开明显差距,他们无疑成为新兴媒介技术扩散过程中最晚也最难抵达的一部分用户。B村老人的智能设备普及率虽已达到一定程度,但实际接入过程中其设备性能、功能利用率、更换频率相较于年轻群体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与落后,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物尽其用,也没有实现与智能设备的深层连接。

家里没有网,我不让他弄(安装网络),平时也没用。这(智能手机)跟原来的老手机一样,我也光接打电话,短信都不瞧。(M14-76)

甚至一些独居老人拥有智能设备却并不能保证触网的可及性,他们的“接入端”反哺并没有预想的顺利和深入,只是单纯实现了设备“从无到有”的过程。由此可见,摆在农村老人面前的是两道“接入鸿沟”,一是智能设备的接入,二是互联网的接入(Wi-Fi/流量)。于前者而言仅需购置设备便可;但于后者而言,触网心理仍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晚辈针对此展开的反哺对于老年行动者能否开始养成媒介使用惯习至关重要,甚至决定着后续反哺实践能否顺利进行。

其次,技能反哺的实践操演。媒介功能习得与技巧掌握的“技能反哺”是接入条件达成后的第二步,也是农村老年人真正开启短视频实践的关键环节。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基本都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又受闭塞的地理位置限制,仅依靠自身的知识储备很难独立完成短视频媒介的使用。“作为一种中介性公共机构,媒介可视为具有能动作用的传播主体,其主体性意义大于技术本身。”^[19]因而“技能反哺”既包含了指导老年人掌握操作技能,又包括对老年人媒介化思维的引导,即学会用媒介来解决问题或为生活提供便利。W02 是一名地道的农民,虽已有 76 岁高龄,但依旧对手机媒介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在家人的指导下不仅能够灵活地玩转短视频,而且还能熟练地完成水电费缴纳和网上购物。

买回来手机之后他们(指子女)就教我怎么样用微信,怎么样看视频,结果一学我就学会了。

我现在还会从上面交电话费呢,比以前方便多了,不用往店里跑了。(W02-76)

该样本接受技能反哺的成效良好,已能够深入到媒介工具意义的构建和掌控中。但不可否认的是,W02 并不是农村老年人的代表,相反,大部分老年人的媒介技能反哺效果,仍然无法达到独自熟练完成较高难度操作的程度,基本的界面操作、简单的互动是农村老人接受的技能反哺的主流内容。

再次,文化反哺的“理解区隔”。短视频是多元文化扎根与繁衍的栖息地,其中流行文化的反哺能够帮助农村老年人跨越消息闭塞的藩篱,实现与新价值理念、多元文化内涵的接轨,以便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入新媒介环境。这既是文化反哺的重要目标,又是“数字反哺”实践“形神相融”的重点

环节。然而,B村老年人短视频文化反哺情况并不十分乐观,他们对此没有过多关注或学习,大多数人表示“碰到看不懂的内容就直接划过去”,身边人也很少对此进行过相关反哺。

咱没文化,有的人家说的就听不懂,一般遇到这种我就直接划过去了。(M09-63)

不理解的就不看了呗,不懂的就刷过去了,不去问别人。(W07-60)

在深度交谈中笔者发现,农村老年人有自己偏好的审美类型,他们更善于欣赏与自身价值观念、文化风格以及审美趣味相符的视频,其中,唱歌、跳舞、戏曲、家庭搞笑段子等类型的短视频备受青睐。而处于流量顶峰的网络流行文化并不受他们的喜欢,甚至被认为没有反哺的必要,部分人对一些另类化、博眼球的视频内容充满了排斥与反感。

我有时候真听不懂那视频上写的东西,看完之后很无语,不知道他这意义何在,没有一点正能量。(M13-72)

有的老人不做老人该干的事,天天在网上“出洋相”,我就看不惯。(W05-68)

不难看出,农村老人的审美旨趣与当下短视频平台上的主流审美是割裂的,甚至是矛盾的。这一点似乎很难通过反哺来达成某一种共识,若是将二者强行融合便容易适得其反。此外,随着老年用户的不断加入,短视频平台聚集了一些属于他们的话语圈子和以“银发网红”为代表的媒介形象。但该类内容仍难以摆脱被操控的嫌疑,同时也并未形成遍地开花之势。可供普通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人的媒介话语实践范围狭窄,其难度和可见度均不容乐观。

2. 反哺场域:家庭代际为主,趣缘社群为辅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把“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场域空间。^[20]在社会反哺实践中,家庭是一个主要的微观子场域,该场域以最直观的方式将两代人连接在一起,并创造出一个互动话语空间。在互动关系中,子代凭借对新媒介资本的占有成为家庭代际间反哺实践的权力拥有者,而亲代则扮演受教育者的角色。除此之外,也存在诸如趣缘社群等其他关系场域的数字反哺,而此类反哺通常在同辈之间进行。

首先,家庭代际关系是农村老年人接受数字反哺的核心场域。以家庭为核心场域的反哺行为并非仅停留于家庭的物理空间,而是转向了关系空间。如今,子代与亲代无法长时间处于同一物理空间,所以反哺实践超脱了“身体在场”的具身化实践方式,通过视频电话、录屏、截图等“缺席的在场”方式进行教授。在B村老年人的家庭场域反哺实践中,祖代之间的反哺行为更为突出。村内大量年轻人在钢铁厂工作或外出务工,因而年龄较小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代替父辈对祖辈开展反哺的现象较为普遍。

我闺女有时候不在家,我外孙女也会教我,别看人家小,啥都会。(M11-66)

家庭场域的反哺具有明显的强落实性,成为祖代、亲代、子代角色扮演、关系维系、权力分配的重要手段。^[7]空心化的农村人口特征使得当今的数字反哺实践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在此情景中,媒介充当了促进家庭关系维系的工具。与此同时,利用短视频这一中介物连接的反哺实践使得家庭内部的互动模式和家庭成员的权力结构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媒介技术话语权被子代甚至是孙代所掌握。

其次,趣缘关系是农村老年人数字反哺的第二场域。该场域的反哺实践通常在同辈之间进行,主要是基于共同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熟人圈层的数字反哺,即已基本掌握数字媒介技能的老年人对其他个体进行教授。在趣缘性社群中,总有一些人对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技术相对熟练,他们在群体内部进行技术指导,建构数字媒介实践的话语想象,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媒介实践水平,而且也增进了朋辈之间的关系黏性。

一开始是看我们广场舞里的人玩这个短视频,就跟着人家学。有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啊,吃饭啊,就会拍着玩。(W08-70)

趣缘社群场域的媒介反哺与媒介实践存在城乡差异。城市地区的老年人趣缘社群具有组织性,参与形式也更加正规,实践装备和实践机会都要优于农村地区。受访者 W02 跟随儿子在一线城市有过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她讲述了城市社区广场舞社群会利用短视频进行日常记录,队员不仅自己拍摄发布,还有公众号进行广泛传播。但当她回到 B 村后,发现村内广场舞队组织十分松散,大家的趣缘活动基本都是“饭后娱乐”而已,群体内部的媒介实践水平也较城市有较大差距。

可以看出,一方面,趣缘关系下的同辈反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心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的反哺受限问题,以“老手带动新手”的反哺模式为农村地区的反哺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并且,处于同一趣缘圈层下的同辈反哺在话语表达、沟通方式和实践趣味上也更融洽和谐。另一方面,相较于城市,农村同辈反哺的水平有限,支撑媒介实践的硬件设备和软性支持皆呈现出松散随意的特征,因而实际的反哺效果和实践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3. 反哺内容:娱乐、实用与社交

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话语建构中,特定的动机和需求是接触媒介的重要目的。老年人对媒介的选择同样基于自身的需求,反哺的内容也以他们的日常实际诉求为中心而展开,大致分为休闲娱乐内容反哺、实用性内容反哺与情感性社交内容反哺等三类。

首先,休闲娱乐内容的反哺。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空闲时间较多,生活相对单调、出行不便,利用短视频媒介来休闲娱乐、打发时间成为农村老年短视频实践的主要动机。娱乐休闲类内容是农村老年人偏爱的视频类型,数字反哺也主要围绕该内容而形成。

看抖音就是为了高兴,平时看的都是唱歌的、搞笑小短剧,打发时间了吧。(W08-70)

休闲娱乐内容的反哺无论是从可操作性还是可理解性来说都较为容易,短视频媒介界面简单,观看视频基本只需要滑动屏幕或点击屏幕就可以完成,学习一次基本就可以独立完成操作。休闲娱乐类内容的反哺难度与理解难度较低,可操作性较高,观看该类内容的实践形式也最为常见。在此过程中,老年人能收获自我效能感,也能通过与内容的共情来愉悦自己的身心,行动主体在这种反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中积极性渐长。

平时就是看一些唱歌或者弹琴的视频,一般没遇到或什么问题,出现的问题我基本上都能解决。(W05-68)

其次,实用性内容的反哺。不少农村老人表示使用短视频是为了获取实用性内容,其反哺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例如如何搜索想看的菜品教学视频、如何在直播间或窗口链接购物等等。就购物而言,一系列操作并不十分容易,尤其对于文化水平有限的老年人来说多次反复学习才能掌握,但大多数个体选择放弃。

我说买一个通冰箱的管道器吧,就是那个地址咋也弄不好。后来外孙闺女给我弄成了,再买东西的时候一点就行了。但就这,我也每天都练好几遍,怕忘了。(W02-76)

没有从手机上买过东西,咱不识字也学不会。(M10-60)

笔者发现,许多实用性内容反哺需要涉及支付操作,作为反哺者的子代对此相当谨慎,他们认为老年人没有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也不可能短时间独自完成相关操作,由此出现老年个体主动寻求反哺却被拒绝的现象。

那一回看人家那水管,我也想买一个。人家(指女儿)老是嚷我“别乱买啊”。我也不会,问人家也不给我说。人家说:“你能抢到手?你会?凡是那便宜的、好的能叫你抢到手里?”(W03-61)

在反哺者看来,实用性反哺的过程烦琐、内容复杂,要想反哺初现成效就需要反复教授,既花费时间精力,也存在潜在的试错成本。这种可能出现的无疑加重了反哺者的心理负担,因而在反哺实操时抱有谨慎的态度,拒绝反哺者接触此类操作和“代理式反哺”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情况。于被反哺者而言,实用性反哺考验实践主体的学习理解能力和真假鉴别能力,且他们很难通过一次学习就完全掌握,而这对于原本就极易产生心理障碍的老人来说也同样会有心理负担,并不断对现有

媒介实践成果甚至是自我产生怀疑。在二者双重“心理负担”的前提下,实用性反哺在农村老年群体中开展情况不太乐观和彻底。

最后,情感性社交内容的反哺。在广大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外出务工,老年人略显孤独,而短视频则成为他们的情感慰藉。第一,短视频的自我呈现拓展老年人的弱关系社交。短视频平台已成为老年人自我呈现的“前台场所”,使用特效、美颜等功能有利于其进行印象管理,从而在同城或同圈层的弱关系交往中获得认同。

孩子从网上给我买的自拍杆,还有我这道具,闲得没事了我自己拍拍发到上面,人家都(在评论区)给我发大拇指还有玫瑰花。(W08-70)

第二,通过对互动、分享技巧的指导巩固与熟人的联系。学会用短视频分享信息、与朋友互动,是将线下强关系互动拓展至线上的重要环节。媒介代替身体开展非具身交往,突破代际互动、亲友互动的物理空间限制,实现跨时空异步传播的可能,促进家庭关系、朋辈关系向更加融洽的方向发展,填补农村老年人的孤独缝隙。

4. 反哺层次:浅层参与与深层实践

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已不再单纯的满足于浏览式观看,开始积极尝试加入媒介实践中去。经过前期数字反哺,农村老年的短视频实践大致可分为浅层次参与和深层次实践两类。

第一,浅层参与。浅层参与主要体现在观看短视频、参与点赞、评论等工具性满足层面,将短视频视作与电视、收音机等一样的信息工具,而无法对于媒介文化、媒介逻辑、媒介思维进行深入实践与理解。农村老年人接受的反哺与其开展的短视频实践都难以摆脱流于表面的境地,短视频媒介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消磨时间的工具。

进一步而言,阻碍老年人深层媒介实践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程度低。对于短视频APP上出现的文本不认识或内容不理解,只能依靠点赞和发表情符号来进行简单地互动,小学学历及以下的受访者几乎都存在该问题,并且很难通过短期反哺得到改善。

我不会给人家私信打字,不认识字,评论也只会发表情,给人家竖个大拇指这种。(M11-66)

二是收入水平限制。虽然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不少老年人还在为了生计奔波,无空闲时间和精力开展深度实践。

我白天做活(指工作),没那闲工夫弄这。(W06-65)

三是自身存在心理障碍,例如对自己容貌或外表不自信、担心被骗等。

我不拍视频,也不乱点。我儿就跟我说的,怕上当受骗。(M12-59)

以上是诸位受访者提及自身难以参与深度短视频实践的原因,然而将目光放及广阔的农村大地,真正存在差距使其身处弱势地位而影响实践成果的远不止如此。社会资源、媒介形象、刻板印象、话语地位等皆是尚未触及也难以被重视的可预见障碍,而农村老人的实践处境也很难依靠微弱的底层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质的构建,因而于多数人而言,媒介的功用便停留在休闲娱乐的意义上止步不前。

第二,深层参与。深层参与主要表现为利用短视频便利生活、拍摄与发布短视频、账号定时更新或参与平台直播等深层实践,主动破除“旁观者”身份禁锢,以“行动者”身份积极加入到文化构建中去。这一层次实践难度较高,但成功后的效果可观。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归属感与被认可感,可以通过构建属于自己群体的文化、组建虚拟社群来提升媒介话语地位。

W05是一个深层次参与的典型案例,她虽然只是一名农村家庭妇女,但在同龄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高中学历)的个例。她爱好弹琴,并坚持几十年,经常发布弹琴短视频并收获好评,这使她获得成就感。但在14位受访者中仅有4位(W03、W04、W05、W08)经常拍摄短视频,且W04是出于工作原因才拍摄。W05只是农村老人中的个案,大部分老人的短视频媒介实践仍徘徊在表层。

此外,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很少涉足深层次参与实践,即使有所深入,目前仍难以摆脱机

械性、模式化的实践特征。W03、W08属于实践积极性较高、实践层次较深的两位,她们向笔者展示了拍摄的短视频,但经笔者观察和进一步询问发现,其视频模式十分单一。

拍抖音只会照着别人的作品去拍,就是“拍同款”,没有自己弄过啥。(W03-61)

我拍视频都不剪辑,不会剪辑。一拍就完了,不会那么多复杂的(操作)。(W08-70)

这种机械化、模式化与片面化的短视频实践方式是数字反哺与农村老人自身相互矛盾的产物,是通往深层实践道路上前卫又保守的尝试,个别先锋行动者摸索出了一条新的话语输出途径并收获满满,而大部分老年人实际上却屡屡碰壁。尽管子女对于深度实践持支持态度,但他们在涉及消费或情感问题时依旧选择回避,农村老年群体的深度短视频实践仍然是一个社会性难题。

(二) 话语呈现与乡村振兴:数字反哺对老年人短视频实践的意义

1. 日常生活新图景

首先,短视频技术生成全新的互动场景。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出了“媒介场景理论”,整合了媒介、场景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介场景影响人的角色行为和社会交往。^[21]短视频创构的虚拟场景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互动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实践模式。一方面,媒介实践场景具有了移动性和可选择性。在移动智能设备出现之前,老年人的媒介实践主要依赖于电视,与此相关的媒介使用行为也被限定在家庭场域。短视频的出现和使用使老年人摆脱物理空间束缚、跨越入驻门槛,随时随地通过媒介与外界社会产生联系。同时,短视频媒介作为一个虚拟场域实现了行动主体实践形式与内容的无限可供性。由此,短视频媒介为老年人打造了又一个休闲娱乐场景,使其在具备移动性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可选择性。

看短视频可方便,有的时候在外面拿开手机就能看,还有睡觉之前躺在床上看手机,比看电视方便多了。(M10-60)

另一方面,农村老年的生活场景具有了更强的交互性。W03表示,自从学会使用短视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不会无聊,子女们还为她购置了自拍设备和道具,使原本因身体不适而无法出门的日子也变得有趣起来。短视频将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延伸到了数字平台,扩大了社会关系的互动范畴,提升了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参与感。

其次,短视频实践弥合断连的人际关系。马克·格兰诺维特引入了“强度”这一概念来指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识时长、互动频率、亲密性和互惠程度是定义关系强度的四个维度,程度越高,关系强度越高,如亲人朋友;反之则越弱,如网友。^[22]短视频实践重新连接了农村老年人的强关系与弱关系。一方面,媒介互动促进了代际间强关系的连接。不少青年人在外务工,导致其与老年人很难处于同一物理空间进行互动。然而,短视频媒介重构接连代际关系,亲代可以通过观看子代发布的内容来知晓对方的近况,子代也可以通过互动参与进亲代的生活。不仅如此,短视频媒介内容还为家庭提供了共同谈资,增加了双方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我儿子在外地上班,我刷到觉得有用的视频就给他转发过去,这也是俺爷俩日常聊天的一部分。(M13-72)

我闺女让我下载的短视频,怕我自己在家没意思。我发跳舞唱歌的视频,有她看见了也给我评论,她知道我天天有事干也就不担心了。(W08-70)

另一方面,短视频实践勾连了趣缘弱关系,提升了农村老人交往的社会资本。短视频为有着共同兴趣爱好或价值观念的个体提供了“潜在联结”的生长空间,能够将老年人的线上、线下活动联系起来,给予他们更多的精神慰藉。通过与群内人员互动,老年个体获得存在感与归属感,弥补孤独的内心世界。在兴趣圈子的协作、互动以及认同中,农村老人的实践资料逐步转化为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促进他们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农村老人趣缘话语的建构体系中去。

我们有一个大群,都是喜欢跳舞的。隔了两天那(群)里面的老婆儿就说:“走!咱去北河了吧,去北河里抖抖(指拍抖音)!”有拍跳舞的、唱歌的,啥都有。(W08-70)

再次,短视频实践提供自我呈现的话语空间。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

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3]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不仅在于某团体拥有话语表达的权利和机会,还在于其话语表达有相应的社会影响。在农村老年人广泛的参与媒介实践之前,其媒介形象一直处于被他者建构的处境,而短视频赋权给予了他们新的展演空间。一方面,短视频助力农村老年人多元身份的话语呈现。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实践者的身份具有流动性与多元性,个体可以同时是多个虚拟社群的成员,在不同的话语场去扮演不同的身份角色,获得成就感。同时,短视频的特效、美颜、配乐、合拍等功能打造了适于自我呈现的特定情境,老年人可以通过场景的营造和道具的使用来完成互动并达到预期展演效果。

我拍的抖音上面都带着美颜,看上去就是好啊,咱这老脸没啥看头了,弄上人家那美颜就不一样了。(W08-70)

另一方面,媒介实践消解了农村老年的“他者”形象。贫穷、保守、固执等是大众对于农村老年人的“刻板印象”。短视频使农村老年人成为自身形象的构建者与传播者,为摆脱被言说、被定义的历史轨迹提供了可能。

我看到一些老年人发一些和年龄不相符的,或者那一把年龄了还做不正能量的事,遇到那种我就会去给他评论,老年人没个老年人的样子,别败坏了这老年人形象了。(W05-68)

2.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反哺实践作为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反哺性的重要力量,它改变着乡村文化的内涵、结构和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一。当前,短视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通过新乡贤、农村大学生、基层干部等青年群体的反哺实践,带动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广大农村人民以开展深度短视频实践的方式,使当地的生产生活彻底地与媒介发生勾连,让短视频红利焕发农村经济与文化的新生机。^[24]

首先,利用短视频媒介开拓农村致富新方式。由于B村中的两家大型钢铁厂占用了相当多的耕地,村民的主要营收方式是厂内务工或外出打工,而老年人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稳定收入或养老金,留在村中的少数人经营一些小本买卖,大部分人依靠子女抚养来维持生活。在此情况下,短视频媒介提供了新的创收方式。具体而言,一方面,短视频直播开辟了家庭营收的新途径。技术反哺开拓老年人的视野与思维,他们可以通过拍摄农村题材的短视频来经营账号,在拥有一定粉丝基础后开始直播带货,利用“电商+直播”的方式实现经济致富。村内有两个粉丝较多的“银发网红”,他们通过拍摄“搞笑段子”成为附近小有名气的网红。经过一段时间的短视频运营,他们在家人的帮助下开始直播带货,相较于同龄人收入可观。尽管依靠流量走红的“银发网红”之路并不是人人随意效仿便可成功的,但不可否认这无疑为农村大地上的一股新兴生命力,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可以预见的可能。

我家旁边胡同那条街的就有个“网红”,人家现在有不少粉丝,儿媳妇帮着她弄那直播带货呢,应该挺能赚钱。(W06-65)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短视频传播力,将互联网思维融入社会生产之中。短视频已深入到农村日常实践的方方面面,并对老年人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W01经常辅助儿媳拍摄一些自家诊所的照片和视频,发布到平台为生意积攒人气;W04和M10拍摄短视频为自己的工作做宣传。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与现实生活产生深度勾连,由此提高了他们接受反哺、开展实践的积极性。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媒介实践是数字生活、智慧生活与农村日常相融的产物,并逐渐扎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构出一种新的互联网思维模式,能够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

其次,借助短视频媒介推动农村治理。乡村短视频具有赋能乡村社会主体的功能,从更大的社会基础结构层面增强了乡村在现代世界中的能动性。^[25]短视频作为一种受众广泛且低成本的信息呈现形式,其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为农村治理带来新契机。一方面,短视频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给官方信息的发布赋予了不同以往的生命活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短视频既发挥了宣传号召作用,又在全民的广泛参与中推动了官民话语体系的融合共生。

这是之前疫情的时候村里让我们去拍的抗疫的视频,发到了微信(公众号)上,还发了抖音,好多人转发还有点赞。大家都愿意看,村里好多老人不识字,拍成这短视频挺有意思,也能看懂。(M09-63)

另一方面,短视频成为村民破除话语霸权、维护自身权益的利器。全民记者的时代已然到来,对于接受过数字反哺的老年人来说,短视频平台成为自下而上维权的理想叙事场域。有短视频媒介实践经验的老年行动主体深知新兴媒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媒介赋权下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老年话语可见度陡然提升,边缘化人物的话语体系不再被隐藏、被建构、被言说,农村老年人正积极成为话语的构建者和维护者。

上半年有个单位欠着老年人的钱一直不给,俺们前面街的一个大娘拿着手机对着厂子大门拍,不给钱就把那(厂子)领导的视频发到抖音上。后来就把钱给人家了,谁也不想发出去坏了名声。(M14-78)

尽管农村仍未全面实现数字实践逻辑的多维度拓展,但短视频媒介实践在老年群体中的盛行对于乡村振兴、农村治理确实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为农村地区全方位地融入数字社会打下了基础。可以说,短视频实践不仅促进了中国农村的数字化与老龄化的关系平衡,而且也农村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为缩小城乡差距开拓了一条新的可行路径,将中国农村最热烈、最深厚、最坚韧的精神文化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农村土地成为“兴得了经济,留得住乡愁”的地方。

五、结论与讨论

置身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强力渗透的当代社会,农村老年群体的媒介实践日渐被短视频所主导。然而,受制于经济条件、教育程度、技术敏感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在“数字反哺”的意义中得以铺展。本研究通过对B村的调研发现:第一,农村老年人短视频实践只达到了简单的“接入反哺”和“技能反哺”,而“文化反哺”略显不足;第二,受村落空心化趋势影响,以家庭为社会单位的反哺呈现出线上反哺、跨代际反哺的特征,且同辈之间的趣缘场域反哺也成为短视频实践的重要反哺方式;第三,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主要以休闲娱乐内容为主,该类内容操作和理解难度较低,老人对此适应性较强,而实用性和社交化内容的反哺实践却有待进一步提升。不难看出,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媒介实践只是流于表面的浅层参与,呈现出模式化、简单化、机械性、功利性的症候,导致整体上的媒介话语可见度、设置力以及传播力稍显逊色。

短视频作为一股潜在的力量正悄无声息地重构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然而,这股力量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既可能是乐园,也可能是深渊。第一,媒介素养与媒介实践的不匹配。多数年轻一代给予的文化反哺严重缺席,导致老年人在面对“不理解”“被封号”“被骗”等问题时依旧束手无策,从而导致其实践积极性下降。第二,价值异化风险增强。被资本所裹挟的短视频媒介,已是流量竞逐的名利场,即使大部分老年人对正负能量的视频内容能够做出明确判断,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潜在意识的浸染却难以招架。第三,过度沉迷影响身体健康。在问及短视频对生活有何影响时,最多的回复便是“上瘾”“对眼睛不好”,多名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视力大不如以前,并且沉迷其中会压缩自己的外出活动时间。

不难看出,数字反哺之下农村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机遇与困境并存,基于变换更迭的媒介化进程与老龄化加剧的社会背景,通过反哺来帮助广大老年人适应数字社会的重任注定无法一蹴而就。首先,重视老年人的数字媒介实践。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农村老年人这一个群体不能被忽略,因为他们是乡村发展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其数字媒介实践问题勾连了娱乐性、情感性以及关怀性话语。政府既可以推动有组织、有计划的公益性数字反哺活动,又可以通过提升村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吸纳青年乡贤等来增加老人与年轻人的接触频率,还可以给予老年趣缘活动更多的组织和实践机会,使同辈反哺更加连贯和可持续,以此实现老年人媒介实践水平的提升。其次,子代应正视和尊重亲代媒介实践的主体意愿,尤其重视媒介素养层面的反哺效果。在子代扮演数字反哺的“施教

者”时秉持平等自由的反哺氛围格外重要,农村老年群体普遍文化程度偏低,而耐心地“授之以渔”比简单粗暴地“授之以鱼”更适合,如此一来,在真正带领他们实现与信息社会深层接轨的同时,也帮助其建立起自信心,有利于两代人关系和谐以及家庭认同感、归属感增值。最后,媒介平台利用界面改进和算法支持来增加老年群体的操作便利性和话语可见度。通过分析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对媒介使用的需求和习惯,平台有能力也有必要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关照全面真实的用户体验,帮助中国农村老年群体构建属于自己的媒介形象和实践路径。

此外,研究结论对数字反哺理论也提出一些新的思考。第一,深化了共性理论之中的个性问题。针对短视频这一数字媒介的反哺研究,补充了数字反哺理论本身在不同媒介种类上研究的特殊性。第二,促进了数字反哺理论的在地性延伸。数字反哺理论中侧重的代际反哺、家庭关系等研究,并不能涵括当代中国老年人的技术/文化反哺问题,一方面,空心化严重的农村并不具备完全的代际反哺条件,而趣缘反哺、同辈反哺亦是反哺理论不可忽视的环节;另一方面,反哺理论关注老年人媒介使用障碍的身体与心理感受,而老年人的媒介实践局限性远不止这些,若一味强调反哺意识的建立则略显“不食肉糜”的无奈。本研究正是在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使用过程中延伸了数字反哺的“中国化”问题,提升了数字反哺的“在地性”研究价值。第三,打破传统数字反哺理论视角下老年人的被动处境。在其积极参与媒介实践的今天,乡土文化、老年文化占据短视频媒介化阐释的重要位置,使自上而下的老年文化风格建构和哺育重新出现,为数字反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农村老年群体对于短视频媒介的创造性使用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社会对于数字反哺的研究视野应该多触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关注其在数字社会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行的路径。中国农村从来不是保守的、落后的,更不是需要受人怜悯的昏暗角落,而是孕育中华文明、中国精神的圣洁之地,它拥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和最深厚的精神底蕴。朴实勤劳的中国农民在步入老年之际需要被社会关注和关爱,更需要从年轻世代、趣缘群体的多维引导下享受时代给予每个人的“红利”,成为数字社会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与推进者。

参考文献:

- [1] 周晓虹.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 社会学研究,2000,2:51-66.
- [2] 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 周晓虹,周怡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93.
- [3] 周晓虹. 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 青年研究,1988,11:22-26.
- [4] 安利利,王兆鑫. 孝道与平权:数字鸿沟中的文化反哺与再哺育——大学生与父母在微信平台上的亲子关系研究.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4:111-117.
- [5] OECD.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49, OECD Publishing, 2001:5.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_236405667766.
- [6] 侯耀婕. 数字反哺能弥合数字鸿沟吗——数字鸿沟、数字反哺与亲子沟通的相关性分析. 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2021:8.
- [7] 周裕琼,丁海琼.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国际新闻界,2020,3:6-31.
- [8] 朱丽丽,李灵琳. 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95-104.
- [9] 刘海明,马晓晴. 断裂与弥合:“银发数字鸿沟”与人本主义伦理建构. 新闻爱好者,2021,3:18-22.
- [10] 赵娜,谭天. 社交媒体中的积极老龄化探析——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新闻爱好者,2021,3:22-26.
- [11] 王敏芝,李怡萱. 数字反哺与反哺阻抗:家庭代际互动中的新媒体使用.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77-90.
- [12] 赵庆婷,高昊. 农村地区老年人短视频使用的数字反哺现象研究——基于山西省中上达村的考察. 传媒观察,2021,9:75-82.
- [13] 洪杰文,李欣. 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 国际新闻界,2019,10:50-74.
- [14] 赵寰,侯清鹏. 融合与反哺:B站破圈的后喻文化解读.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6:45-53.
- [15] N. Couldry.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2004,14(2):115-132.

- [16] 徐婧,汪甜甜.“快手”中的乡土中国:乡村青年的媒介呈现与生活展演.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2:106-117.
- [17] 何志武,董红兵.短视频“下乡”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重构——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3:14-23.
- [18] P. Attewell. The First and Second Digital Divid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1, 74(3): 252-259.
- [19] 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4:137-154.
- [20]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4.
- [21]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1.
- [22]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9-71.
- [23] 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 [24] 李文峰,姜佳将.老区与新乡: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遗产与反哺——以浙江余姚梁弄镇革命老区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8,6:77-83+157-158.
- [25] 魏景霞.乡村短视频的社会治理价值变异及矫正路径.领导科学,2022,5:138-142.

Short Video Practice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Feedback: An Academic Investigation Based on Village B in the Central Region

Zhao Hongxun, Shi Kefan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pervasive penetration of smartphones, the rural elderly spend more time in watching short videos. However, in the digital practice, they are still in disadvantaged position and need to use the discourse logic of digital feedback to connect their practice of short video. Under the view of digital feedback theory,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issue of short video practice of the elderly group in Village B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narrative analysis, and finds that acces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re feedback of the rural elderly's short video practices. The feedback takes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as the core subject, supplemented by the relationship connection of interesting communities. Entertainment, utility and socialization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elderly's short video feedback, which is superficial. The digital feedback of short video practices of the elderly have problems such as superficiality, mechanization and schematization, but short video practices which are the initial results of feedback bring new vitality to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rural elderly and ev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also contributes to balancing the inherent conflict between digitalization and ag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digital feedback; elderly groups; media practices; short videos; village society

■收稿日期:2022-12-06

■作者单位:赵红勋,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河南开封 475001
史可凡,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刘金波